

# 出访随记

——突尼斯章

(回族) 石舒清



2002年5月23日

今日离开约旦到突尼斯。

在约旦首都安曼机场，过安检时，我数次被拦了回来。虽然自身清白，料也没有什么，但这样数次被拦回也使我无端地慌张起来，觉得自己肯定是有什么问题了。

那个负责安检的警察舞着警棍焦灼地说着什么，不停地示范性地比划着，似乎苦于我不能理解他的意思。

但我瞬间理解了，他是要我投降般地举起手来。我就举起手来。他立刻大喜，一时亲热得如老相识，一边笑着，一边风中的麦穗那样频频点头，一边熟练地操着警棍，拍土似的匆匆在我身上来了一轮，便摊开一下双手，挤弄着眼睛示意我过去。

有惊无险，我也大喜，朗声地向他道着再见，他那孩子气的样子颇使我动心，觉得他与我所见的警察真是不一样。也真想上去紧紧地抱他一抱，但我还是匆匆跑开了。类似这样只想不做的冲动在我心里是很多的。

在安曼机场候机两小时。偌大的候机室里，来往着许多阿拉伯人。许多阿拉伯老人眼神深邃而镇定，像修士，我很想上去与他们搭话，讨教一二，又觉得他们和他们身上的白袍一样，有着一种冰雪难犯的凛然之气。精神的东西总会反映到面目上来，人的气质也因此千差万别，大相径庭。

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不知要回家还是要去旅游。央珍和那两个小孩子玩，那一对夫妇就用宁和而满足的眼神望着他们。上了飞机央珍才跟我说，真不相信他们竟是一对夫妇，女人最多二十八

九，男人却似年近花甲了。我们已知道约旦是允许一夫多妻的，想必这个年近花甲的老人还有着二三个与他年龄相仿的妻子吧。

几个身体强健、眼神机敏而锐利的小伙子坐在韩作荣先生一边，似乎散漫，但又显得紧张不安。他们狠狠地抽烟，不耐烦地吐着烟圈。虽然都很年轻，但我总觉得他们是历经过大事的人。如果拿木头来做比喻，就觉得他们绝不是椽子，至少也在檩子一档。我一时有个很古怪的念头，觉得要扭断我这样一个脖子是不费吹灰之力的，但要扭断他们的脖子，却有着一种扭断钢铁般的不易。我暗暗打量他们，暗测着他们的身份。

韩作荣坐在他们旁边，自顾抽他的烟。我莫名地替他担着一份心，想唤他过来。这时一个鹿一般高迈的姑娘走过来坐在了韩的另一侧，她手里的箱子颇显得沉。一眼就看出她是一个历练不少的人，她的眼神超逸却不空洞。这是一个到任何地方都会显得出众的女人。她的脸略显憔悴，但这憔悴却像是她有意为之，像名画上的旧痕一样，成了她的别一种魅力。大概是为美所慑吧，一贯显得气定神闲的韩作荣也不禁看她一眼，然后吐出一个无所用心的烟圈来。我知道这至少也是千里挑一的女子，但我又真切地觉到她活得并不完全幸福。像她这样超尘越俗的女子，是无需亲自带这么一个沉重的箱子的。她是什么人？她究竟过着怎样的一种生活？

她定然过着一种我不可想象的生活。

终于到了上机的时间，人们开始纷纷起座排队上机，我注意到那女子坐着不动，似乎有些忧虑地望着排队的人们。

下午3时左右至突尼斯机场。我国驻突尼斯使馆顾参赞携一对青年男女来接，那一对青年男女真似金童玉女，望一眼也让人觉得眼亮神清。天涯处处有芳草，由不得在心里这样感慨了。顾参赞个头不高，但显得干练而富内涵。不知为什么，在异国他乡见到中国人总有一种难以言道的亲切感，真像是见了久别的亲人一样。

突尼斯作协的一个人带一辆大巴来接我们，他长得很结实，光头，浓眉，穿着随意。随顾参赞来的小姑娘给我们介绍说他是一个短篇小说家，已出版短篇小集五部。好了，终于碰到一个写作的人了。这才记起在约旦时，我们没有碰到

一个作家，也没有和一路陪同我们的人说过一句关于文学的话。

然而在突尼斯我们却说了个够，岂止说了个够，简直是把我说害怕了，真没想到突尼斯人是如此热衷于文学的话题。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在宾馆稍事休息，顾参赞等就带我们去转突尼斯老街。较之于约旦，突尼斯人更显得淡定从容。街头行人不多，但也不少，有着一种波涛在浩渺的水面上缓缓推行开来的繁华与旷远，似乎所有的人都是来观光的，似乎没有一个为生活迫使得慌不择路的人。

在这样的街头转，人的心很容易由燥热转为静凉，像出了某种窄狭，而渐至一种宽阔。

突尼斯老街实际上是一道“Y”型的手工业街，街道逼仄，两边店铺挤挤挨挨，数不胜数，经营多是皮革及金银制品。杂多而精良的手工业制品弄得人眼花缭乱。都后悔不该在约旦买东西，应该在这里买才是。这里的東西品类博杂不说，而且似乎还便宜啊。我们都是喜欢买便宜却又精良的东西的。

但大家约定了，今天是只看不买。风物长宜放眼量啊。还有几天时间呢，顾参赞等给我们考虑得很周到，最后留半天时间专供购物。因为只看不买，所以我们一个个装得像富翁似的转悠着。

突尼斯人大方、热情，做生意尤胜着约旦人一筹。过任何一家店铺时，坐在门口的店家早就备好了一脸笑意将你迎住。

先用日语问一声你好。你装出不高兴的样子，说你是中国人时，他们立刻恍然大悟似的点点头，然后用生硬的汉语说：“你好，请进来看一看。”“看看”两个字，往往被热情无限的他们说成“干干”，让人哭笑不得。

你说，只是看看罢了。

似乎一下子你说到他们心里去了，他们会露出一丝惊诧的意思，将肩胛骨耸起来一时不松开，连声说，是的，是的，就是看看而已，看看而已。似乎他们的本意就是只让我们看看，并不想让我们掏钱似的。我们一笑，他们也就开心无比地笑了，同时将耸着的肩胛骨松下来。一次我发现一位老人在他的店铺深处笑着招呼我进去，货物的杂多使店铺里有些暗，刚开始我把老人的笑脸误作成了一个发着暗光的铜盘，到真的看清时倒吓了我一跳。老人见我终于看到他了，将脸上的笑意又加浓一些，come

in Comein, Please just look, 他不断地这样用英语说。我向他笑着摇摇头, 他也就笑着, 会心地将头点着, 允许我无尴尬地离开他。在这样的街面上即使做不成沾便宜的买卖, 即使只是走走, 也是很快慰的。

老街后面有一座清真寺, 据说已相当古老了。我们登上宣礼楼去看突尼斯街景。和约旦一样, 突尼斯鲜见高楼大厦, 我们住的国际饭店不过十余层高, 但已显出鹤立鸡群的样子。突尼斯举国千余万人, 实在是不必造那么多的高楼的。

上到高处, 才觉到风很大, 很响, 这风是从地中海海面上吹来的, 强劲而湿润, 人是很乐意以身受之的。

老街旁边的一建筑物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在那大楼接近顶端的前墙上, 镶嵌着一尊耶稣的半身像。耶稣的面目镇定而忧郁, 似望向深邃的天空, 似望向渺茫的远方, 又似移目下界, 忧郁而慈和地垂望着地上往来的生命。他似乎在长久地观望中情不自禁地伸出一双手来, 手心向下, 像是以此安抚平静着盲目而躁动的人类。突尼斯是一个伊斯兰国家, 却在闹市区高悬有指点迷津的耶稣像, 不知是什么意思。但我觉得有这样一双高悬于半空, 镇抚着下界的手还是很好的, 我们在世上活得迷茫而困顿, 真是需要有这样一双大手来指引和抚慰的。

一会儿走到那楼下, 我记起了什么似的仰脸一望, 真是吓了一跳, 或许我离大楼太近的缘故, 只看到一双罩向下面的大手, 那手掌里积满阴影, 显得阴郁而突兀, 而神像的脸, 却看不见了。设计神像, 肯定是要求人仰望的, 那么为什么不让人仰望到神的脸呢? 我原本以为这手是给我们平静与安慰的, 现在, 仰脸一观时却让我觉得莫测而恐惧, 似乎那不是神的手, 而是命运之手, 是专门带给我们无常与难测的。为什么不要我们看神的脸? 为什么要拿这样一双神的手给我们看? 这是设计者的本意么? 如此设计, 是想告诉我們一些什么呢?

稍站得远些, 即可看到耶稣的面目, 那一双手也由严峻而变得情势缓和, 像是真的在轻柔地安抚了。但我总觉得站得远远的望神是不对的。我们就是从神的一双高悬的手下面走过来的。稍立得远些, 倒可以看得完全, 但神的位置和我们的位置似乎都因此而不对头了。算是胡思乱想吧。但以后几天,

每每走过那大楼时, 我都情不自禁地要仰面一观那双巨手, 我觉得恐惧和震撼, 觉得有种种神秘莫测的意味要从那一个个指缝里漏下, 要附到我身上来, 要潜入到我的魂灵里去。我不能不看, 又不敢久看, 匆匆地近乎仓皇地从那双手下面走过去, 走到天空明朗处, 哪怕一无所见也好, 哪怕一派茫然也好, 我都觉得可以暂时地出一口气, 暂时可以将身子和缓下来了。我想这样一双手肯定会叠次出现于我梦里的, 然而竟没有, 一次也没有, 使我由刚开始的担心而转为渴望, 渴望我的梦里能显出那样一双手来。在梦中, 这样一双手会更高悬吧, 会从破开的云层里探出来吧, 会探出于一片电闪雷鸣中吧。由担心而至渴望, 人的念头真是不可理喻的。

我只能说, 那是一双让我难忘、恐惧却又不解的手, 是的, 难忘, 恐惧却又不解。

夜, 住在十一层的一个房间里, 风声很响。坐在飞机上也不曾听到过这样劲响的风声。更大的风似乎在高楼之上不休地掠过去。在风的劲响中, 我像服了清醒剂似的, 一点睡意也无。觉得楼如同海上的巨舟一般给人一种飘摇感。说实话, 我是喜欢大风的, 在强劲的风声中我会觉到一种不可言喻的安宁感。临着阳台是占了一面墙壁的玻璃门。拉开窗帘, 推开玻璃门, 在阳台上往街上一看, 才觉得在没有上过百层楼千层楼之前, 十一层楼原来也是很高的。虽然街灯一律亮着, 但毕竟夜深了的原因吧, 街灯总是略显昏黄。街上还零星地走动着一一些人, 像在一个很迷人的峡谷里走着。街头的长椅上, 也坐着一些人, 或成双成对或孤身独坐, 但没有超过三个人坐在一起的。大家都追求着夜的这一份清寂和安宁吧。相对默坐或单独想想心思, 在这样的夜里都是很合适的。我返回床上睡了一觉。再到阳台上看时, 长椅上还有人坐着, 也还有人来往在街上, 一个年轻的女子从街心走过, 金黄的头发一扬一扬, 使她如走在水上, 走在梦里一般。

感到整个城市都深海一般睡着了, 只余了几个孤单的守夜人陪伴着一街昏黄的路灯。

风声似乎升高了, 但依旧劲响着。看来这座城市已习惯于在风声中人睡。

我打算睡一会儿再来看这梦一般的街景, 然而竟一觉睡到了大亮。

2002年5月24日

我国驻突尼斯使馆文化处为我们代表团印制了精美的日程册，一天中要和哪些人座谈，要游览什么景点，这景点有何特色，来历如何，要住哪个宾馆，日程册上都写得明明白白。这使我们非常感慨，也感谢我国使馆工作的周到。听了我们的赞扬，使馆陪同我们的顾参赞等也很欣慰。说我们这次运气不错，几乎能在短短的几天内游览遍突尼斯所有的著名景点。

今天的活动是上午与突尼斯作协座谈，下午去蓝色小镇。

我早晨一起来就折腾着穿西服扎领带。因是要去与主人正式座谈，总还是着装符合礼仪为好。上次与约旦方座谈时，我原以为至少韩作荣先生不穿西服吧，到场一看，却见人家早已领带扎得整齐，西服穿得妥帖，央珍还穿了自己本民族的服装，长裙曳地，飘然绝尘，使客人眼亮，为我们增色。牛玉秋也穿了过膝短裙，显得精神干练，像是年轻了十岁。只有我一个穿着便服。我虽表面强作镇定，内心却实在有些尴尬。好在没有人说我什么，大家都像并不曾看见我没穿西装一样。我当时就下过决心，到突尼斯一定要好好弥补一下，不但要穿西服，还要扎领带。领带，我带了两条的，只是苦于不会扎它。很早以前戴过红领巾的，我只会用扎红领巾的方式扎领带。

领带尚未扎好，出发的时间已到。

集合后一看，真是恼煞我也，原来这一次韩作荣先生既没有穿西服，也未见扎领带。那么我为什么要用这样一条令我犯难的带子勒住我的脖子呢？我悄悄抽出领带，藏入口袋里去。最不济我还穿着西服吧，我这样不无安全感地想着。

突尼斯作协离我们的住处不远，可步行过去。一路见街面干净宁和，天空净无片云，湛蓝似海。风声依旧在头顶的高处劲响着。这里的风与我们国内常见的一起风就扬尘颇不一样，这里的风只是声音强劲，而不见影形。一再觉得这风声是率真而清澈的，不愧是由海上吹来的风，就是与陆地上吹来的不同。这风声听多了，人就会清爽和健康起来吧。阳光洁净裕余地普照在街面上，使街上的人如往来在一面巨大的镜子里。电车在街上血管一样流通着，车上站着的人很少，更不见一车乌烟瘴气的

拥挤。在一条街的两边有树，树干直高而粗糙，几乎到了末梢，才被谁胳膊着那样，禁不住扑哧一笑似的绽出一些枝叶来，颇似西方某些身材高大的球员却留着局促的孩子发型。树叶阔大，在清澈响亮的风声里翻卷不已，光影明灭，一瞥之间，使人觉到无端的幸福和忧伤。这风声，这阳光，这街景，这翻卷的叶片，总使人很容易就沉浸到迷离斑驳的往事中去。

然而没有想到突尼斯作协竟会是那样的逼仄简陋。我们沿着只容二人挨肩并行的昏暗楼梯上到二楼，见作协办公室只有十余平方米大小，三五个接待者加上我们六个人，办公室里就已坐得满满腾腾了，日程册上说，我们是要与突尼斯的作家们座谈，但突尼斯的作家在哪里呢？我们将在哪里谈呢？就在这里吗？

办公桌像老古董，像别处救济给作协的。我们坐着的沙发都破出了里面的棉絮。我觉得这个国家作协与我国的一个乡村文化站的规模设施相仿佛。

不可以貌取人啊。我暗暗警告着自己。

后来发现与我们座谈的突尼斯作协会员只是那有数的几个人，而且听说就这几个人里还有记者云云。真是国情不同啊。我想起在中国，即使我们固原地区要开一个作家座谈会，至少也有百十号人与会吧。

作协主席瘦得像一根木雕。要是走在街上你断然不会觉得他会是一个国家的作协主席，他要是戴一个红袖标，在一幢楼前看自行车倒是很相宜的。但他真的就是突尼斯作协主席，一张口一谈吐你就知道了，他出语不同凡响，立刻让我感到诺贝尔奖的授奖辞和演讲辞一类，站得高、看得远、讲得深。随着他的讲话，随着我的细看，随着我的目光在他身上的专注，我突然一再觉得将这个老人看差了，看轻了，老人是需要细看的人，细看才能看出他的真面目来。这时候我才发现老人的眼神非常镇定有力，他看你时，目光似乎在你身上重重压了一下，而且还要压到深隐处去。他的每一条皱纹都显得老辣而有力，似乎每一条皱纹都有着不俗的来历，都绝然不是白长的。他坐在那里，像一段树根在深土中那样给人一种深固的稳定感。当他说活时，他的牙齿会很多地露出来，让人觉到像一只雄狮在不断地张口示威那样。一旦停住说话，他的唇就强有力地抵

住，似乎于双齿间咬着一些铜铁之物，他的话与话之间是总有停顿和沉默，那沉默让你觉得不是断裂和空白，而是使分散的力量聚合起来，越聚越多，越聚使内力越大，终于情不可抑，破口而出。作协办公室的墙上悬有他和总统的合影，他形容镇定，举止淡然，和我所见的我国一些作家与毛主席合影时的样子真是太有不同。我们诚惶诚恐的那种样子是掩饰都掩饰不住的。

他介绍了突尼斯作家协会的简单情况，会员多少，作协分会多少，全国会员大概有四百余人吧，作协分会共有十五个，巴黎也有一个分会的。在座谈中，那个枯瘦的老人以强正的言辞表达了对西方文化自以为是的姿态的不满。他毫不遮掩地谈到巴勒斯坦问题，他说作为一个作家，作为正义和良知的代表，作家们应该永远关切并援助人类中受践踏受凌辱受迫害的那一部分同胞。

整个座谈会，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促我不断回味的，就是这个貌似枯木实际上拥有不可战胜之精神的老人。他的名字叫买达尼·萨利赫。

午饭时，牛玉秋老师又发零花钱给我们。每人七十突尼斯第那尔，含给宾馆服务生的小费在内。突尼斯第那尔比不上约旦第那尔，两个突尼斯第那尔兑换一个约旦第那尔，兑换人民币六元。发钱是最让人高兴的事情，发意外之钱更让人心爽神快，欣喜不已。我突然想，仅发零花钱一宗来看，出国也是很有意思很快乐的啊。

中午稍事休息，就去著名的蓝色小镇。

据说一个月前江泽民主席到突尼斯时，就特意提出要去蓝色小镇看看。据说看过后颇流露欣赏之意。

等我看过蓝色小镇后，觉得像约旦的“过去的世界”和“佩特拉峡谷”一样，这又是一个我的笔力远难描述的地方。

蓝色小镇距突尼斯城约十八公里。乘车出城，因路上车辆不多，我们的车行驶得很快，给人一种飞行之感。越过一辆小车，驾车的女子神态安闲，似乎她并不是驾车飞驰，而是坐在喧嚣不已的海边凝视着远处的水天一色。

出城不久，见路边有一工地。原来是正在施工中的美国使馆。美国使馆原在城内，恐怕发生不测，因而搬到了郊外。就想起在约旦时，美国

使馆外面也是重兵把守，如临大敌。美国搞得全世界不得安宁，弄得自己也神经兮兮，疑神疑鬼，真是何苦来哉。一路陪伴我们的那个短篇小说家说，全世界都在憎恨美国，但又没有办法。

突尼斯人的官方语言据说是法语，我国驻突使馆的工作人员因而也都是法语系毕业生，听我国的那个小女孩与突尼斯短篇小说家一路用法语交流，真叫人羡慕不已，语言不通当然是一种障碍，但有时也因其神秘而成为一种不浅的魅力。

总统府也在郊外。看起来并不很大。围墙也不是很高，借着跑力，似可一越而过的。门外走动着一批士兵，倦倦的，如在梦游一般。

蓝色小镇到了。停车场上停有好几辆客车，看来前来游览的人不少。阳光亮亮地照着镇子，宽大的树叶在蓝天的映衬下喧响着，这声音使人的心明净、斑驳而又空幻，似乎始终有细碎的银子的声音在心里，在脑际，在两耳之外的广大处闪烁迷离，喧响不已。从任何一个角度看过去都能看到辽阔在小镇后面的地中海，或是一小角，或是一大片，都深透湛蓝，使人在一瞥之间眼睛像被清洗了一下，而且像是被洗到了眼深处。沿着长砖铺就的街面，我们缓缓而上，高处白墙蓝窗的房子像不断地向更高处缓缓飞升着一样，使人一再觉得是在一个童话的世界里走着。两边林立的手工业店铺诱惑着人的购物欲，我们虽然决心不买，但还是忍不住去看。看到我们的人都喊“江泽民”，待我们寻声一望时，那喊的人就喊对了似的一脸笑。我又一次为他们那单纯的笑感染了。我真想学着他们的样子笑一笑，但我是笑不出他们那样的笑的，难道他们心里一点痛苦和愁肠的事也没有吗？能笑出这个样子来，真可谓是人生的一大福气啊。这里的人似乎心无介蒂，毫无防范，明明你是一个陌生人，一照面时，他却亲善地向你笑起来。那笑直接是由心里来的，像茶壶里倒出的茶那样裕余而自然。他那样一笑时，一张陌生的脸，一张异国的脸，陡然地让你觉得熟悉了，让你觉得一定在哪里见过。

镇顶端有一个草席咖啡屋，里面的长椅上铺有草席，还有炕一样的东西，一些人坐在里面，神色闲淡地抽水烟，喝咖啡。他们把这咖啡屋叫舍榜斯咖啡屋，“舍榜斯”，意为吃饱了不饿的人，是单身汉之意吗？

镇子上错落有致地建有不少白壁绿窗的别

墅。偶尔我们在一座别墅下经过时会神情困惑地望上一望，总有一株开有白色红色或紫色小花的树从墙上探过一些枝叶来，像调皮的小姑娘在望着行人，但看样子她在里面很开心，她只是调皮地看看而已，并不想下来从游人而去。据说这里是一个非常著名的艺术家村，有许多世界上负有盛名的艺术家都到这里来观光过，有过艺术创作活动。使馆二等秘书刘宗泽，就是我所说的那个“金童”一直陪同我们，记得向他询问过，都有哪些艺术家来过这里，他说了一些名字我都没记住，只是隐约记住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

大家都议论说这里购一套别墅会是多少钱，都发挥想象力想着，忽然，韩作荣说：“恐怕有钱这里也买不上地方啊。”

这一说大家就都笑起来，想想可真是这么回事呢。

又到镇后面看了地中海，海水碧蓝，不断地堆起雪浪来涌送向远方。惜乎未能到海边去。海边的树叶愈加劲响着，使人觉得自己一定丢掉了什么，或者是自己被丢在了什么地方，耳听叶响，眼望大海，使人觉得有那么多的不真切，似乎一切都是梦，都是一个记忆，包括这眼前的闻见。老实讲，这里虽然我未曾来过，但总觉得在哪里依稀见过，只是时已久远，记不真切了。人的感觉真是奇异的。

我奇怪地觉得我所遗失和忘却的童年的一切都在这里，我的那些亲人的亡魂也都在这里，像一片海浪，一丝风声，一朵小花，在这里停泊着，眷恋着，牵记着，浮游着，我的鼻根莫名地酸了一酸。

后来我们都有些舍不得离开蓝色小镇。顾参赞他们似乎早就预料到了，蓝色小镇还有一家地中海世界音乐中心，广有影响。我们今天虽然来了，虽然近在咫尺，但我们并不去参观它，我们将另有半天时间专门来参观音乐中心，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借机再来一趟蓝色小镇。

据介绍说，蓝色小镇有一位叫萨义德的苏菲派圣徒墓，我两次来都未曾一见，对一个回族人而言，这实在是非常遗憾的。

晚上，朱邦造大使宴请代表团。朱大使曾是我国外交部发言人，他从发言人的席位上退出后，很多人都很怀念他，觉得他的气度，措辞方

式都是很能显示一个大国襟怀和大国尊严的。这次一见，朱大使果然非同凡响，既气质超然，又让人觉到亲和可近，他那爽朗自信的笑声颇能感染人，使人觉得肩上的负担心上的石头都在他舒朗的笑声里一下子就没有了。他说他1999年到过宁夏，盛赞宁夏是个好地方，我想凭着大使的严谨，是断不会无端加誉一方的。又是一个夸宁夏的驻外大使。朱大使说他到过张贤亮先生的影视城，说到张贤亮先生时，朱大使眼里一亮，足见张贤亮先生留于他的印象之深之重。

朱大使引我们参观大使馆。使馆庄严而气派，让人看了觉得又踏实又自豪。使馆是一个国家的象征，真应该建设得能体现出一个国家的国力和气魄才是。朱邦造大使说，驻突的各国使馆里，中国使馆应该说是建造得最好的。这便好。

然后朱大使把使馆工作人员集合到礼堂里，邀请张炯、韩作荣二先生给他们来一次文学讲座，他高兴地自况说，他是雁过拔毛的人，今天机会难得，他们使馆有不少喜欢文学的人。朱大使并非虚言，强将手下无弱兵，这几天与刘宗泽闲谈之间，他读书之多，见解之深，常常搞得我有捉襟见肘、手忙脚乱之感。

张炯先生讲中国文学的近况，全面而犀利，大不同于与客人们座谈时的言论。大概那种座谈又要守时，又怕犯忌，加上还需要翻译架桥引渡，总有着种种不便吧。

但最让我心折的还是韩作荣先生，我真是轻看这个沉默寡言的人了，原本以为他内里一定丰厚博深，但也许会有些不擅言辞。事实证明我想错了，他讲得很好，讲诗，讲出许多深味来，真是为我们代表团增色不少。

讲座后去吃饭，我竟被安排在朱大使旁边。这使我有些不安，兴许我是一个少数民族的缘故吧。饭极丰盛。大家吃得有味而文雅，有酒，但没有猜拳行令的声音。席间，朱大使谈到一些文学现象，谈到余秋雨、季羡林、张中行、钱钟书等人，刘宗泽适时接话，看来他们读书不少。

吃罢饭，大概时已不早，出门来，见一天的星星汪在深蓝的天上，像开满了湖面的莲花一样。空气凉爽而清澈，一张口就深凉到你的肺腑里去。

我们和大使作别。

“回去代问张主席好。”大使向我送过来这样一句话，我永远记住了在夜色里大使举起两臂向

我们作别的情形。

“金童玉女”各开一车送我们。

我，仲教授，央珍三人坐小女孩开的车。车无声地起动了，像从水上行开的船一样，小姑娘像弹琴那样把着方向盘，方向盘在她手里似乎显得灵性了，似乎她只把她的小手轻轻放在上面就行了，似乎方向盘会自控，用不着她多费心的。

车沿一条偏僻的街行驶着，始终像船行驶在水上。她用梦里一般的声音和坐在前面的仲教授低低地说着什么。

我只想轻轻闭起眼睛来睡觉，像自在浮荡的船在无垠的水面上入梦了那样。

2002年5月25日

日记摘抄：

晨，8时起床。是日去比赛大省。黄昏返回。

10时半至比赛大，参观比赛大港口，建于5世纪拜占廷时期。

又参观海洋生物馆，无甚趣味。

在一家叫 Vita top 的地方喝咖啡，听女诗人朗诵诗作。圣纪日。

午后，与比赛大作协会员座谈，有惊无险。

先说说 Vita top。

Vita top 是一家咖啡屋的名字，在一座很陡峭的山顶上。是一位女诗人的女婿开的。开车当然上不去。我们往山上去时，越来越大的风似乎要把我们像土块那样吹刮下来。

咖啡屋前有一个巨大的帐篷，我们就被安排在那帐篷里喝咖啡。帐篷被吹得晃来倒去，发出巨大的响声，我们身后的头顶的篷布像被无数个硕大的拳头袭击着，噶，这里一声打进来了；噶，那里一声又打进来了。我们都在这风声里大声言讲，倒是别有一番意趣。

女诗人已经很老了，但是热情似火，天真似儿童，忽然她拿出几本书来，笑着深深地看你，像发水果糖那样把书一一发到我们手里，原来是她的诗集。接着她就给我们朗诵她的诗了，她无可奈何地看了看一边被风刮得鼓来凹去的帐篷，忽然一扬头，像是进入了某种角色，像是换了一个人，她大着声音朗诵了起来，仅凭那时而激越时而细腻的声音来听，那也一定是一首不可多得

的好诗。但旁边的光头小说家却悄悄对央珍说：“她是一位平庸的诗人。”央珍又把这话传于我。我们会心地笑笑，继续宽容而欣赏地听她朗诵。的确，即便那女诗人的诗不好，她还是有着许多值得欣赏的方面的。一诗终了，我们报以热烈的掌声，可惜掌声淹没在滔滔的风声里，听起来并不真切，但我们起劲拍着的巴掌女诗人是看到了，她眼含幸福的泪花向我们致谢。

在那里女诗人还让我们品尝了一种很特别的食物，那食物是专门纪念穆圣才做的。原来，5月25日是穆罕默德圣人诞辰日。我们叫圣纪日。在我的家乡西海固，今天也是一番节日气象吧，我怀着虔敬和纪想之心，多吃了几口在圣纪日才做的食物。在高山之巅，在强风之中，在帐篷之内，在圣纪之日喝咖啡，这样的咖啡一生也喝不着几遭吧。

午后在比赛大作协与当地作协会员座谈。

比赛大作协比国家作协气派多了，来座谈的人坐了满满一会议室，足有四五十人。还有几个女作家。其中有一个不知什么缘故，始终神秘地笑着。

我发现突尼斯作家都特别健谈，而且大都出口成章，这使我吃惊不小。一会儿，团长张炯先生让央珍讲西藏文学时，我料到大事不好，偷偷逃了出来。我一气上到四楼，在走廊里乱转着，想不到廊宇回环，竟使我迷路，找不到座谈的地方了。

也好，慢慢找吧，等我找到，座谈也结束了。

但这时那个光头的短篇小说家突然钻了上来，他是来找我的吗？我们似乎心有灵犀，突尼斯人不但会说阿语、法语，还会说英语。我就用英语说，我害怕说话，因此逃了出来。我又指着我的胸口说，这里面跳得厉害。他听了大笑，笑得很是开心，说他也是害怕说话的，我也就大笑。我们悄悄地在四楼站了一会儿，估摸着差不多了，下去，却还在讲，是突尼斯的一个女作家在讲，她说中国出过一套蓝袜子丛书，收过她的一篇小说。我正好有这本书，当时想了解阿拉伯女作家的思想状况，在整套丛书里，只买了这本阿拉伯卷，读后印象颇佳。想不到在这里遇到了作者，而且还如此年轻。惜乎记不得小说的具体情节了，不然可以私下与她谈谈，好使她得到些许安慰。我怕她讲完后座谈会还不散，我再逃出去就不大好，于是构思着让我说

话时该讲些什么，听到这位女作家也提及巴勒斯坦问题，说到作家们在巴勒斯坦民众遭受灾难时不该无动于衷。看来巴勒斯坦问题在突尼斯作家心里烙印很深。

她一讲完，座谈会就宣布结束。是该结束了，已谈了好几个小时了。有惊无险，我得了自由一般欢喜。

晚上和央珍出去给她的旅行箱买锁子，才8点，突尼斯的商店已全部关门了。原来突尼斯一到8点商店无分公私，一律关门。该工作就工作，该休息则休息，突尼斯人绝不在休息的时间还忙于生计。街上到处是悠闲的散步者，最红火的是咖啡馆的生意，咖啡屋门外的场地上，摆满了桌椅，人们淡定从容地坐着，像丰收之后舒坦无虞的人那样，静安地坐着品评他们的生活。

他们是休息了，却苦了我和央珍，为了一把小锁子，跑着找那还没有关门的商店，8点过了还不到六分钟，难道真就没个例外么？

例外还是有的，小锁子却是没有。

我们发现这时候容易买上的唯有香水一类。在一家香水店，我们碰到一中年人带着他的三个女儿在给妻子买生日礼物，他挑得很细，然后征求女儿们的意见。一个小姑娘不断地打量我和央珍，我觉得她的眼神是很特别的，像笼着一抹轻雾，看在你身上，像看着一个非常遥远的什么。

快快地往回走时，见街边的墙根里瑟缩着一个卖花的老人，他把墙挤得那么紧，像要挤入墙里去做一块砖头。花在墙影里像一束暗水。

你发现了么？在这个国家咱们还没有见过一个乞丐。央珍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

两天后，趁尚未下班之际，我和央珍在一家店铺里买到一枚手指头大的黄铜锁，售价两个半第那尔，合人民币十五元。在买的时候就看出是中国制造。在我国，至多卖两元钱吧。

2002年5月26日

今日去托泽尔。说是路上得坐车八个小时，听来令人生畏。我们出访突尼斯期间，我国文化部也有一个代表团在突尼斯，因此刘宗泽抱歉说他不能陪我们去了，但他说托泽尔是非常值得一去的地方，在这座城里有突尼斯最大的一家私人

博物馆，有一个在阿拉伯世界广有影响的叫闪拜亦的大诗人。我们的日程册上介绍说，托泽尔是一个优美而富特色的城市，被誉为诗歌之都，而且托泽尔诗人众多，好咬文嚼字，喜诵诗歌和《古兰经》。于是我们都把重任放在韩作荣先生肩上，指望他能以诗会友，舌战群儒，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我们的预计是不错的，不但托泽尔，好几个城市一听韩是诗人，立即揪住他不放。韩也不辱斯文，大方应对，使我们镇定欣慰不少。

6时就被唤起。刚到7点，我们的车轱辘就转动了。一路跑得寂寞。和约旦不同，突尼斯的植被似乎略强于约旦，在约旦时我仔细观察了，几乎没见到一棵大树。作协主席里娜德博士兴冲冲地邀约我们去看她的后花园，我们看了都没有吱声。那花园三五平方米见方，地上的土块中混同着瓦砾，几朵花和高不过人的几棵树几乎有些尴尬地立在那里。中东中亚地区植被很差，不见是想象不来的，看过一则短文，说我国的宁夏向科威特派有植树援助团，我国若能在科威特的土地上植活一棵树苗，如若这树苗长过了一米，科方就付给我方人民币两万元，真是好买卖啊，但这买卖肯定是不好做的。突尼斯的路边倒是有不少树，虽鲜见合抱之木，但高过屋顶的树还是不少的。路边田地里的庄稼又疏又矮，透过庄稼能看到面目生硬的地皮，似乎比我的家乡西海固还要旱。行驶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倒屡屡有一种回到故土的感觉。偶尔的一片地貌，一抹山形，惊得我跳起来，真像是我坐着班车过同心向海原去。韩作荣先生去过固原数次，我便把窗外的景色指与他看，“是的，是挺像的。”他看着说。

突尼斯人似乎比约旦人严谨一些，陪我们的光头小说家别说歌舞，连话也是很少的，他上车不久就先我们睡着了。司机是个中年人，车技很好，但也只是开车而已，除了看到你亲善的一笑外，话也是一句也没有的。这个司机长相不像穆斯林，倒像是个欧洲人。但后来发现我们只以高鼻梁、深眼窝来辨识穆斯林是很不牢靠的，很多突尼斯人都像欧洲人，不但突尼斯，约旦也有这种情况，像在约旦时全程陪同我们的那两位女士，黄眼睛黄头发，谁也看不出是个穆斯林，说成法国人、意大利人倒是很容易令人信服的。

我后来想起给我们开车的司机像瓦尔特，表情坚毅、镇定，眼神于温和中深隐着一种固执。



让这样的人开车放心倒是很放心的，只是他千里路上也不开一个口，也不把车上的录音机打开，我们就更其觉得这旅途的枯燥与漫长了。于是剩下司机，大家就都睡觉，偶尔睁眼一看，会发现每一个人都睡得疲倦而痛苦。

10点左右，至达尔旺城。这是整个非洲最早的一座伊斯兰城市。

我们下去活动腿脚，短篇小说家领我们去喝咖啡。

阳光强烈无比，似乎所见的一切都像树叶里漏下来的光点那样晃动不已。真想把眼睛浸到深水里凉一凉。但我很喜欢这个地方，这里的人几乎全是民族打扮，白帽、盖头、长袍，不知道如此毒辣的阳光下面，又是长袍，又是盖头的他（她）们怎么就不热。到处是店铺，有售银铜器的，有售皮革制品的，有售古色古香的坛坛罐罐、刀刀剑剑的，店铺错落杂陈，显出许多随意和散淡的意思来。到处是阿拉伯音乐，到处是诵读《古兰经》的声音。不知是从收音机、录音机还是从电视中传出来的，然而却又不很响，汇合一处也不很响，就像无数沸开的茶壶以近似却又相异的声音呓语着。在杂而不乱的店铺间，在强烈得让人眼目昏花的日光下，在那么多像修士修女一样缓缓往来在阳光中的人影里，听着这迷魂阵似的阿拉伯音乐，人真有一种蜜蜂迷失在花海里的感觉。出国一趟，访问了两个国家，走遍了异国的十数个城市，但最让我体味到阿拉伯风情和那种阿拉伯独具的神秘意味的，在约旦是那个石头宫殿，在突尼斯就是这达尔旺城了。说来奇怪，我自然是第一次来达尔旺，但觉得对这里的一切早就熟悉了，熟悉得几乎和自己的家乡一样。在这里，我几乎没有异国之感，真是有些神秘了。出国归来，检点记忆，觉得自己只是真切地去过达尔旺这么一个地方，至于其他，都随时飘忽，同乎梦境了。

下午3点到托泽尔。旅途劳顿，早像一捆蔫草，先住下来再说。托泽尔宾馆很有非洲特点，大厅内壁的前墙上凿有几个拱形屋，屋内雕有塑像，都像什么艺术之神，似与伊斯兰教无关。雕像似为玉石所成，表面光洁，质地颇好，最让人叹服的还是雕工。我细看了所雕的一个男子，气宇轩昂地站着，眼神宁静而邈远，似乎面前是无

尽的辽阔和深远。这一定不是人的表情和眼神，人要有这等表情和眼神，也就近于神了。好半天我才发现他原本是没有两臂的，我为自己的无所察觉和疏漏至此感慨不已，我觉得这不能怪我，因为从雕像的表情、眼神，从雕像的任何一个方面都没有看出残疾给人带来的那一种局促和不安。我略有所悟，人的精神世界的充盈，人的内心的镇定、气质的超尘拔俗竟会使确凿的残缺也会显出一种难以言道的完美来。我似乎一瞬看出什么才是真正的残疾。

外面热似蒸笼，宾馆内却静凉如窖。几个肤色黝黑的女子正拿拖把详尽地拖洗着大厅，她们的服装也是特别的，茶色，下身似我国的灯笼裤，上身是长过膝头，结带挽裾的长袖衫，好像我国宋代妇女的打扮。

我住403，原拟随服务员上楼的，但她领我却向下面去，我有些困惑，但想到必然她是对的，于是一路随去，楼道宁静，游浮着暗影，走了一会儿，果然到403房门前，看来这403是在地下面的，怪不得静凉如此。一进屋又是一惊，除了一张宽大如潮的双人床外，斜对角还有一张身材瘦小的单人床。什么意思？但那宽大素洁的双人床像湖水一样诱惑人扬臂舒腿，躺到它上面去，真想睡一觉啊。但这么好的房子可不是让你白住的，先得去与那些咬文嚼字的托泽尔诗人们座谈啊。

果然是喜好咬文嚼字的一伙，一个座谈会，从6时半开到近10时，还不罢休。来的人很多，据说有哲学家、心理学家、大学教授，但最多的还是诗人。韩作荣先生是躲不过去的，又是介绍中国的诗歌状况，又是朗诵诗作，我也未能幸免，介绍了中国的穆斯林文学状况，我是颇苦于当众说话的，暗暗指望他们能发发善心，将我赦免。但他们哪里肯放，又揪住我问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穆斯林与中国的佛教徒通婚否？一是中国穆斯林文学怎样才能从汪洋大海般的中国文学里浮出水面。

我据实回答，他们都很专注地听，一律庄重地点头，但我看出他们对我的回答并不完全满意。托泽尔人说话时慷慨激昂，出口成章，倾听时神情凝重，眼神专注，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律神情庄重，做倾听大事状，一律点头，一律做会心的微笑。”我在日记中这样记到。

托泽尔作协主席颇像巴尔扎克，说今年9月份，中国还要派一个文化访问团，来参加他们的迦太基文化节，说托泽尔要在2004年举办一个“闪拜亦诗歌节”，盛邀中国的诗人们届时前来。他说“闪拜亦诗歌节”的“节徽”已设计好了，有趣的是这设计者恰好是一位中国画家，还是女画家，叫杨明威，年龄不大，颇具才华。这时候仲教授说“闪拜亦”是闻名世界的大诗人，不幸英年早逝，他的诗在中国广有传闻。接着仲教授以阿文朗诵了闪拜亦的一首著名的诗，内中有“一旦人民要生存，命运也要听从”的句子，托泽尔的诗人们立刻精神大振，一边倾听，一边合着仲教授的节奏轻轻念着。那情景使早有些不耐烦的我一时很感动。想不到这两句诗被团长张炯先生适时逮住了，以后遇到合适的场合就说闪拜亦的诗在中国也有一定影响，尤其像“一旦人民要生存，命运也要听从”这样的诗句，更是流布甚广。突尼斯的诗人们听了感动自豪得直点头。众多慷慨激昂的人里也还是有例外的，我身边坐着的一个老人就从头至尾一语不发。他似乎只用一片粗糙的灰布裹着身子，感到布片里就是他干瘦洁净的身体，再无别的衣着，他赤脚穿着一双布做的拖鞋，在我身边一直轻轻地均匀地呼吸着，没有和我说一句，没有看我一眼，据介绍说，他是一位诗人。我总觉得他像是刚洗了大净出来，肉身和心灵都静若处子。觉得他很像甘地。

座谈终于草草结束了，很多人显得意犹未尽，“巴尔扎克”发给我们每人一张诗人闪拜亦的素描画像，诗人面庞清瘦，目光忧郁。据说辞世之时诗人还不足三十七岁。这张画也是中国女画家杨明威画的。杨明威，说是一个年轻姑娘，只身来日照强烈的托泽尔访问写生，忍不住想，怎样的一个中国姑娘呢？

晚餐毕，“巴尔扎克”和光头小说家邀请我和央珍去看露天电影。我不想去。央珍固执地要去，说机会难得，睡觉有什么意思呢？便去。

“巴尔扎克”开车，三拐两拐，来到一个别有洞天的地方，有一大池水，一大片人坐在露天的树下面看挂在两棵树之间的电影。是约旦的一个女歌唱家的专场音乐会，一直是那歌手忧怨地唱着。大家喝咖啡，闲聊，看得并不用心。天空蓝透了，稀稀的几颗星，掉队的孤雁一样。月亮很圆，不知道是十五还是十六。树冠在高处伞一

样撑开来，像是撑开一片浓影，只在树冠的边际隐约看出一些枝叶来，在难以觉察的风里倦怠地响着。这一切都使我们如坐在一个精心设置的布景之中。那月亮、星星，以及树叶倦倦的声音让人思乡而忧郁。我们喝了一杯咖啡，照了两张相，就离开了。

车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喝醉了似的停下来，这是因为“巴尔扎克”接到了一位女性打来的电话，“巴尔扎克”双手拿了手机放在耳边，用深夜里的老鼠那样的声音和对方叽咕着。

“一定不是他的妻子吧。”我对央珍说。

回到宾馆时，宾馆里一片寂静，似乎连勉强亮着的灯都睡着了。我们蹑手蹑脚地各自回屋，很快就睡得东西莫辨了。

2002年5月27日

昨夜，闻鸡鸣声，生思乡感。

今日游托泽尔老城，果然不同凡响。建筑物一律砖雕而成，饰纹朴素中见华丽，随意里有庄严，引人一观再观，百观不厌。街两边用砖雕有巨型花瓶，像梅花鹿立在街边，昂首远眺。似乎任何一样你所见之物都诱惑你驻足留影。拉骆驼的人从街上缓缓走过来，他和他的骆驼在眼神和步态方面都很有些神似。

托泽尔城已有二千五百年的历史了。旧章新篇，托泽尔城真是不愧这两千五百年的积淀置换啊。

难忘的是那一顿晚餐。

那的确是一顿晚餐，由于座谈占去了不少时间，开饭时已经很晚了。

主人给我们安排了一顿别开生面的晚餐。在餐桌一边的空地上，有一个四人组成的乐队，乐手们各执一种乐器，穿民族服装，没有客套，没有开场白，没有乐手介绍，我们刚入座就餐，他们就或拉、或弹、或敲地演奏起来了，听说坐在最边上的中年乐手是斯法克斯音乐学院的院长。

在阿拉伯音乐声里就餐，又是活生生的人在那里演奏，真让人觉得有些奢侈了。

斯法克斯的文人们又一次激情澎湃了起来。许多人都把餐具扔到一边，站起来即席赋诗，有一位诗人，长得颇似我六外爷，要是他们二人蓄

然见面，一定会惊疑对方为鬼了。他自始至终就似乎乐在其中，难以把持，在音乐声里不断地动着屁股，抖着肩膀，将两手像羊角那样举起来，晃过来晃过去。他还举杯一再向张炯先生致意，然后自己仰脖把那酒干掉。仲教授说，阿拉伯人难得喝一次酒，喜欢喝酒的人也只是趁待客之机多饮几杯，而且也只是啤酒而已。几杯酒下肚，那诗人很容易就做出一首诗来了，他当即起身朗诵，那激情的造型，那夸张的声音都搞得大家忍俊不禁。

看来我把突尼斯人看错了，原来突尼斯人是很开朗很浪漫的啊。

但我实在有些累了，只想休息。我想我们都想休息了。坐在对面的光头小说家关切地望我，用口型暗暗询问我，同时把一只手掌放在耳边，然后闭上眼睛，头歪一歪，意在问我是不是这个意思。我疲倦地笑着点点头，他就举头寻觅作协分会的主席，似乎要对他说什么。

但这时候乐声却急骤起来，四个乐手在音乐声中用铜和水那样的声音唱起来了，气氛随之一变，似乎一瞬间之间令人耳目一新。那个坐卧不宁的诗人带头跟乐手们唱起来了，一边唱，一边将头颤悠着，似有不胜之痛切，不但唱，还跳起来了，不但一个人跳，还把旁边的一个青年人也拉起来和他一同跳了。乐声铿锵、悦耳，像一山一山的野花次第开了，像一湖接一湖的清水用无数邻片闪烁着碎银般的月光。我似乎一瞬间跌入了一个梦境，觉得嗒然若失，又觉得有什么东西像水波花香那样不断向我涌来。神秘的阿拉伯音乐又一次将我魅惑了，使我不觉意间就沉醉其中。

那两个人完全沉醉在歌舞中了，他们跳得那么率性，那么自然，那么陶醉，那么忘情。我发现他们的舞蹈并不复杂，似乎只是很随意地扬扬脚，摆摆手，扭扭臀，抖抖肩，但为什么那样赏心悦目呢？我想大概是因为他们的那份陶醉与忘情，那份自然与随意，简直像微风拂动的柳条一样天然而顺应。是的，他们只是顺应着一种旋律与节奏，顺应着一种奇妙的声音和花香，他们不是在跳舞，他们只是在快乐，在以此表达着他们内心那种无往而不适的欢乐。

我听出来了，这就是在约旦听过的那首歌子，不断地重复以“安赛俩目尔来空目”。“安赛俩目尔来空目”，阿语，你好之意，为客人祈祷，

向客人致安，都是这句话。

他们是在为我们祈祷吗？是在向我们问安吗？

如此勾魂摄魄的音乐，人生能得几回闻啊。野花竞开，香气阵阵。

舞者愈来愈多，这时伸过来一些热情的手约我们跳舞。我是不会跳舞的。但央珍已像一条惊鹿那样跃起来了，张炯把椅子往后挪着站起来了，牛玉秋、韩作荣都站起来了，都像被一股快乐之流席卷着去了。

还犹豫什么，跳呀，管它会跳不会跳呢？跳着就是了。

我发现除了央珍，我们几个都是不很会跳的，但我们的脚再也停不下来了，我一脸忘情了，陶醉其中了。我们和突尼斯的朋友手拉手，肩并肩，忘乎所以地跳着，我们被自己溢出来的激情感动了，我们的手紧握着，亲得像一家人，像一个人……

音乐会办成了歌舞晚会，歌舞晚会在激情恣肆到不可收拾时戛然而止，我们的舞蹈停止了，欢乐的浪潮却纷至沓来，一浪一浪地将我们淹没。

我们每个人都一身大汗，额头发亮；我们每个人都觉得意犹未尽，才刚刚开始。

原来我们也是会欢乐的。

原来欢乐起来竟会如此容易。

张炯先生带着满头大汗，在喘气未定时就作了激情的讲演：“很久没有这样欢乐过了，斯法克斯的朋友们，我们会永远记住这个欢乐的夜晚，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们，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热情款待。”

是的，我相信我们都会记住这个夜晚。

要告别了，大家一时竟然恋恋不舍，我望着那个像我六外爷的人，真担心自己落下泪来。

至于刚才还困扰着我的睡意，早不知什么时候就没了踪影。

后来想，人的心绪真是俯仰不一，变化难测啊。

2002年5月28日

今日参观斯法克斯的两个博物馆。8点半出发，但到10点钟还一个博物馆也没有去。当地陪同人士一定要让我们见一见他们的文化官员。但文化官员又似有什么公务，一时脱身不得，我们只有干等着。对主人让我们见见他们的文化官员，大概

是一种礼节和规格吧。但我们是一点也不想见什么官员的，时间紧迫，机会难得，我们只想尽可能地多转一些地方，多有一些了解。但入乡随俗，我们压着心里的急火表面斯文地坐着。

坐倒是坐在一个很好的地方，那是一座古建筑，类似我国的古堡，我们坐在第二层的一家叫“岱哇”的咖啡屋里。那屋顶是百叶窗似的设计，能漏下千万片阳光来。里面有人喝咖啡，有人抽水烟。我发现一般的咖啡屋都有水烟设置。一个抽水烟的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他倚墙孤坐，眼神机警而多变，果然一会儿仲跻昆教授过来说，那人悄悄告诉他，说他是暗探。怪不得有那样的眼神。他虽然直白地坐在那里，但我总觉得他是躲在什么后面，并且不停地窥视着。突尼斯人知道这是一个暗探吗？他会告诉他的同胞说他就是暗探吗？这是我第一次真刀实枪地见到暗探，因为自己的身份无可探究，倒觉得他这样的角色有些怪异，据说突尼斯一百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警察。那么警察里面的暗探又有多少呢？

这些耳目和爪牙。我想。

我的目光小心地游到他脸上时，我看见他有意无意地笑了一笑，笑意隐约，像细如发丝的风掠过水面。

应该和他照一张相的。为什么要照，说不清楚，总之是过去照了。照片洗出来，我发现他还是那样的眼神，看来他那样的眼神已是训练有素，不易更改的了。

我们又在咖啡屋照相。

我和张炯先生互相给对方照，照片洗出来，都不禁失笑了，千万片阳光落了我们周身，使人斑驳陆离，像鳞片发光的鱼又游入闪闪发光的鱼网里一般。

等文化官员接见我们之后，已近正午，日照当头，心绪散乱，多么了不得的博物馆也无兴趣看了。

晚上，突尼斯《国家新闻报》记者苏哈比约我和央珍去看突尼斯颇负盛名的一位小说家。

这里先说说苏哈比。

一日中午，我们几个在街头闲逛，突然一高个儿青年将我盯住，似认识我。我也诧异。我想我是一个外国人，他是不大可能认错人的。我向

他笑笑，打算过去，他却叫住我了，问我到哪里去。我说你认错人了吧。他就红了脸，急切地说我们那天去突尼斯作协时他也在场，说他是《新闻报》记者。这就轮到我抱歉了。苏哈比是个腼腆的小伙子，也极热情。这时候央珍也过来了。他就邀我们去喝咖啡。我是不大想去的，央珍要去，就去了。在一个很偏背的地方我们喝咖啡。苏哈比极力想与我们谈一些什么，他法语一定很不错的，英语发音却有些问题，使我们不大听得懂。苏哈比就显得很焦灼，脸一次次红着，语言夹杂着手势欲说还休。实际上可以不说话只喝喝咖啡的。但苏哈比似乎觉得只喝咖啡便有些对不住我们，还得为我们说点什么、介绍点什么才是。真是难为他。他拿出几页报纸来，指着上面的文章说那正是他写我们的，他指着我和央珍的名字让我们看，可惜除了名字外，我们什么也看不出了。

后来苏哈比就说他有一个小说家朋友，我们如果愿意他可以带我们去见见。

我就想着这小说家是个什么样子。我奇怪地觉得那只是一个发表了三两篇小说然后就自命不凡用眼角看人小伙子。

我是一个懒得动弹的人，更无兴趣去拜访什么人。

央珍却与我相反，认为到异国他乡浪游景点倒在其次，关键是要见一些值得一见的人。“我们可以选择晚上的时间，晚上只是少睡一会儿觉，又不耽搁什么。”

于是就联系。苏哈比给小说家打手机。就定在28日晚上。

苏哈比打手机的时候，我想那小说家刚从一个昏昏沉沉的梦里归来，一边把一只脚撑在一面墙上，一边躺在床上哈欠连天地接着苏哈比的电话。

我越想越不想去。

8点半，苏哈比准时在饭店大堂里等我们。见我们应约而来，苏哈比露出孩子那样天真又欢喜的笑来。他的脸略有些黑，使他的牙齿显得格外洁白。

为了方便谈话，我撺掇苏哈比叫上了翻译仲教授。我知道仲教授是面情软的人，一叫大概不好推脱，果然是一叫便去。而且更好不过的是，听仲教授说，他认识那位小说家。

说是小说家的妻子要开车来接我们，让我们去某个站牌下面等她。

突尼斯的夜景真是安谧而祥和。我们走的是偏街，街上行人稀少。所见的人都像是刚从海边来的，显得安宁而沉思。突尼斯的街道很干净，沿街见到一些垃圾箱，和我们常见的铁锈斑驳、臭气熏天的垃圾箱很不相同。它们干净、整肃得像不是用来装垃圾的，在垃圾箱周围，围拢着一些系得紧紧的黑塑料袋，像喝足吃饱的狗卧在墙根里安睡着一样。我们就哑舌称赞着突尼斯街道的安宁和洁净。虽然有路灯，但依然能看到天上的星星。苏哈比问中国有多大，人口有多少。在我们的回答里他不断地惊讶着。他说他们虽然说的是法语、英语，但他们更想说汉语。他说苏联解体了，他们都希望中国能强盛起来，能取代苏联原有的位置，与世界上一些不义的国家抗衡。

我们在一个站牌下立了一会儿，就见一辆小车远远地朝着我们驶来。

小说家的妻子来接我们了，令我颇感意外的是，那老婆婆已是满头花发，至少六十开外了。

小说家站在他的楼下等我们。

我瞥了一眼，见他家的车库里还有一辆小车。

小说家一见我们，就像一个爆炸了的手榴弹那样激情难抑起来。

原来他和仲教授见过面。

仲教授后来对我们说，与1997年他们相见时比较，他已经老多了。

小说家家里又富有又颇具情调。我们随他直上二楼去，楼道几面深阔的墙壁一直到楼顶挂满了大大小小的装饰品，总有千百件之多，其中有不少油画。据说所有的画都是小说家自己画的，他不但是个小说家，还是个颇具名望的画家。

二楼更是一个艺术天地，从楼内设计到装饰，无不让人觉得是到了个真正的艺术家家里。主人张罗着让座，但我们都没有坐，不由自主地在里面看这看那起来。苏哈比流露出一自豪的样子，似乎说：“此行不虚吧？”看来突尼斯艺术家日子是很好过的。这小说家又是一个中国通，在他那形形色色、异彩纷呈的摆设中，有不少产自中国的东西，那高过人头，绘有中国仕女图与梅兰菊松的四条屏就有两套。还有从桂林搞来的老式家具，从山西大同弄来的巨型花瓶，还有唐三彩……迢迢万里，也不知他是用什么手段运过来的。从我们一进门老人

就讲个不休。他发言铿锵，颇具激情和锐气，每一句话出来，都好像激流冲溅到巨石上。我觉得不说别的，只像他那样说半个小时也会筋疲力竭。老人不是在说，而像是在吼喊着。他的妻子、儿子、苏哈比都坐在一边，安静而又欣赏地听着他激情飞溅、口若悬河。我突然觉到自己这样的写作者的乏味了，总是像死水一潭。我忽然觉得真正的诗是什么样姑且不论，但真正的诗人毫无疑问就应该是老人这样的。他就像一大壶滚沸的浓茶，一上来就滚沸着，而且一沸到底，似乎一点也不在乎将自己烧干。他长着一头如波涛如野草似的卷发，虽已全白，但似乎汹涌着一种不可扼制的力量。怒发冲冠，很容易就想到这个成语，是的，这样的头发是戴不了任何帽子的。我一直诧异，老人这激情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如此充沛激荡，就没有个绝竭吗？难道老人就这样亢声直颈地说了一辈子话吗？就没有人出来喝令他声音小一些，温良恭俭让一些吗？我觉得这位老人要是对着机枪嚷一通，连机枪也会哑然的了。老人的声音始终震撼着我们，激荡着我们，使我们了无倦意。虽然他只是与仲教授说着，虽然他说的话大多我们并不明白，但正像巨浪海啸的声音我们并不明白，却轻易地感染着我们一样，我们都觉得与这样的老人呆在一起真如注射了强心剂一样。

老人指着我说，他对中国的熟悉程度肯定超过了我。他那颇有气势不容辩驳的声音使我觉得他说的一定是真的。在七十余年的岁月里，他到过中国七次，出访过八十二个国家。北朝鲜也去过七次，南朝鲜却是一次也未去过。他独不喜欢苏联的共产党，尤其不喜欢斯大林。但很喜欢毛泽东。他与金日成关系颇好，似写过《金日成》，他指着墙上的一张他与金日成的合影，说这张照片是在金日成逝世前一周照的。还看到他同巴解主席阿拉法特的一张合影，似乎在开一个性质严重的会议，他坐在阿拉法特旁边，两目如炬，威严如狮，他像嚼铁咬石那样说他恨美国，说这个国家太过霸道。我当时强烈地觉得美国让这样一位性如火的老人恨着实在不是一件什么妙事。

他毕竟是熟悉中国的，让女主人给我们端上茶来。从约旦到突尼斯，这是第一次在客人家里喝到热茶。他陪着我们喝茶。屋里因突然缺失了他的虎啸龙吟的声音，竟一时显得寂寞，似乎整个屋子一下子成了空的。

地板上铺有豹子皮，我试着踩了一下豹皮的头部，心里掠过一阵很异样的感觉。

苏哈比说老人原是突尼斯作协秘书长、突尼斯电影局局长。他说老人还是一位著名导演，他捧红过不少女演员。苏哈比说，老人就是有一个毛病，喜欢女孩子。我们都善意地笑起来。但老人没笑，喝一口茶，又电闪雷鸣那样讲起来。

坐了很久，我们照了不少相。末了老人又给我们赠书，详细地问我们的姓名，然后在扉页的左上角，写上塔形的一段话。他写得那么认真，像刚开始学字那样。告别之际，我们又去参观了他的书房，里面有几幅油画，他说是他女儿画的。

在灯光下，在树影里，老人送我们出来，如果他不出声，会觉得他是很瘦弱的。人的声音也会是一种奇异的力量。

老人和我们拥抱惜别。

我永远也忘不了他趁贴脸之际附在我耳边的喃喃低语，他说：“穆斯林穆斯林，我的穆斯林小弟弟。”整个晚上，这是他说得声音最小的话，却像用一把幽秘的钥匙打开了我的暗锁一样，使我牢牢记住，再也不能忘怀。

我用力用我的脸贴了贴老人的脸，老人的脸有些粗糙，有着一种岩石般的硬度。一生只能贴一次的脸啊，贴一次就永难忘怀的脸啊。

这一次是老人的儿子送我们。

老人又到车窗前再一次与我们作别，车行驶了，我看见在葵叶似的灯光里，老人那挥动的手后面，树的枝叶也若有所思地动着。

夜似乎很深了，街灯虽一一亮着，也显出一种孤清来。车像行驶在水上。天上的星星很远，

似乎灭了，但又亮起来。

奇怪的是，我们都不说话。车行驶的声音在静夜里很响，似乎不断地溅起清水来。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我身上有着一种大海落潮那样的感觉，而且我固执地认定不仅只我一人有这感觉。

我知道那像潮水一样从我们身上退落着的东西是什么。

一盏一盏的街灯像要闯入我们的车里来，但猛一接近时，又飘然逝去。

我突然觉得我在突尼斯的日子，如果缺了今晚的见闻遇合，一定是很遗憾的，突然觉得许多时候，刻意的安排倒不如随缘之遇。

听得央珍像说梦话那样对苏哈比说：“苏哈比，今晚，谢谢你。”

这也正是我想说的话。

苏哈比，这个提议让我们把他装在箱子里带回中国的小伙子，这个想寻个中国姑娘做妻子的突尼斯的年轻记者，听到谢谢，欣慰而腼腆地一笑，什么也没有说，示意让我把头枕在他的肩上睡觉。

我突然觉得此刻要是能离开突尼斯真是再好不过。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带着这腼腆而又纯净的笑意，带着那被轻轻道入耳深处的话，带着这被惜疼过的颜面，遽然离去，我的心里会是怎样的充实，怎样的余响连绵。

不是还指望着再去蓝色小镇吗？

说真的，一瞬之间，我突然不想去了。即使有这个机会，我也不想去了，我为什么非要把我喜欢的东西看个满足呢？

我枕着苏哈比坚实而又暖热的臂膀假眠，梦想着这正是在通往回家的路上。